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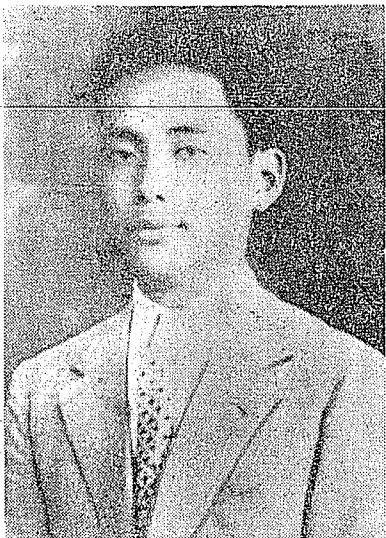
五十年滄桑

從報人到世界樂壇

何名忠

入復旦新聞系苦讀

余五歲時，先父雪生公聘何子蘭老師，教授三字經、千字文，後讀四書、詩經、古文。十五歲，舊制中學畢業，時當革命潮流澎湃，先父飭赴廣州就學省立第一高中社會科，正值革命軍北伐時期，革命思想濃厚，余亦於此時開始研讀三民主義，深佩 國父為人及見解之卓越。猶憶當



民國十七年六月本文作者十六歲在廣西大學肄業時的照相。

時有同鄉梁某及黎某，彼二人原為共黨青年份子，不時向我宣傳共黨在各地殺人放火，乃革命行動，余斥此乃盜賊行爲，何足稱道，有時我們辯得面紅耳熱，幾致動武。

民國十六年，因共黨在廣州煽亂暴動，發生戰事，遄返故鄉，十七年馬君武博士在梧州創辦廣西大學，報名應考，果被錄取，被編入農學院，為第一屆西大學生，自今西大第一屆同學留臺者，僅余與秦道堅及鍾嘉文三人，每次客鄉話舊，迴想當年聚首，殊嘆滄桑。

在西大僅讀一年，因粵桂戰事爆發，西大停辦，奉先父先母之命於十八年秋赴滬就讀，余家境清寒，雖耕田二百餘畝，因人口繁多，食之者衆，生之者寡，籌措學費不易，幸得伯父金波百般張羅，籌得大洋四百餘元，得以順利由香港乘輪到上海，當時英語程度太差，經過數月惡補，總幸於十九年一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該校為上海有名私立四大學之一，校長李登輝博士，為名教育家，教授多為當時學術界泰斗，余習者為新聞學系，此為本人經過縝密考慮所選擇者。該系主任為名文學家謝六逸氏，因在校時頗下苦功，

深獲師長及同學之愛重。尤蒙謝主任愛護，亦獲得老師黃天鵬先生之指導及其對新聞學之豐富智識，引起對新聞事業之興趣。謝主任派我主編復旦大學校刊，兼復旦大學新聞通訊社（簡稱復新社）社長，此兩機構，均為新聞系實習機構，責任重大，實深惶恐，第當時正似「初生之犢不怕虎」，硬着頭皮去幹，使我在辦報方面，獲得不少經驗。對我後來在南京、上海、成都、舊金山及祕魯辦報，得益良多。猶記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戰事停止以後，我曾以復新社記者身份，訪問當時抗日英雄翁照桓將軍（按翁將軍方於民國六十一年秋間病逝香港，至為可惜），曾將訪稿，以復新社名義發送到上海各大報，結果時事新報、時報，均以頭條新聞用復新社名義刊出，其他如申報等各大報，亦均刊登，當我看到各報頭版刊出之消息時，真有點驚喜若狂。剪下向我的系主任報告，謝主任面露笑容，深為嘉許，勉勵繼續努力，以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民國二十二年夏季，修完復旦大學學分，戴上方帽子，當時南京中央通訊社總社因業務展開，特請復旦新聞系主任謝六逸先生推薦一位同學

擔任記者，蒙謝主任過愛，立即薦我前往擔任。初出茅廬，人地生疏，諸感困難，但憑苦幹硬幹實幹精神，漸漸把困難克服。南京中央社當時有外勤記者八人，採訪實行分區分類制，遇大事及大典時，即全體出馬，分工合作。我被分配採訪國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考試院、內政部、首都警察廳、法院及文化教育等部門之新聞。每星期一上午十時參加國府紀念週後，將新聞播放全國，除聆聽中樞各首長宏論外，且利用紀念週散場時，採訪許多精彩新聞，實為意外收穫。



本文作者民國三十九年六月為華僑學校籌募基金在加拿大溫哥華演奏古箏時留影。

桂省貸金留學日本

在中央社供職不一年，忽接到家父來信，謂廣西省府新設有留學生貸學金制度，如赴日本留學，每年省府可貸留學費用七百大洋，此款可敷一年之用，余以機會難逢，申請貸款，當蒙批准，於民國二十三年秋到日本留學。因在大學時代，曾習日文，到日本後，再經過兩三月之日文惡補，且租住日人房屋，朝夕和日人講話，又獲得我的房東小姐親切招呼，教我習日文及練習發音，使我的日本語文，進步頗速。隨考入明治大學新聞科，蒐購各種新聞學書籍並時到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各大報社參觀實習，尤留心製版無線電傳真，及電傳照相之技術。在日本兩年多時間，讀完明治大學新聞科學業，領到一紙文憑，目睹日本軍閥侵略中國野心，絕無截止，中日總會一戰，令人杞憂。由於我曾在中央通訊社服務，留日期中不時為京滬各大報及雜誌寫通訊，揭發日本軍閥野心，喚起我國朝野加緊防範，遂為日本的警察注意，認為我是反日份子，警察局的「刑士」（暗探），不時到我家中訪問，深感困擾，有一次兩位「刑士」似乎要和我攤牌，態度惡劣，率直問我：「何樣！（日語樣即先生之意），你究竟是親日份子抑或是反日份子，務希坦白告我。」我知道他們來意不善，惟有以柔制剛方法減低緊張氣氛，免遭囚獄之災，我含笑回答他們稱：「我是親日份子，同時又是反日份子，因為日本女子，美麗溫柔，體貼丈夫，所以我國留日生，一向視娶日本太太是人生三大幸福之一，對日女誰不親之愛之。但對於日本朝野瀰

漫着侵略中國論調，刑士先生！你若果設身處地，是不是會反日呢？」我說完後，三人相顧大笑，卒將他們送走。從此之後，日本暗探很少到我家中打擾了。

民國廿四年暑假，我偕好友池清華君、梁君、馮君、伍君四人到日本鎌倉海邊避暑，每天到海濱游泳，當時不知生死，一人遠游海岸，乘風破浪，與波濤搏鬥，原為人生樂事，不圖某次（似為廿四年八月廿七日），當我由遠距海岸一千多碼回游之時，兩腿突觸到一堆白色棉花型毒物，痛癢無法忍受，驚恐過度，筋肉收縮，體重增加，就要沉沒，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忽然靈機一轉，猛然驚醒，忽記起昔日關雲長刮骨療毒時，忍痛鎮定如常的功夫教訓，使緊張精神，鎮定下來，得以再度浮起，拼命掙扎，終於游回海岸，已精疲力盡，但倖免一死。以上兩件事，在日本的遭遇，使我對人生獲得了一極大啓示，即愈到危急關頭，愈須鎮靜、堅強，若驚慌退縮，便不能應付危難。先總統蔣公常訓示我們「處變不驚，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確為應付亂世之金石良言。

歸國成親戰時工作

由於日本侵華日益積極，戰爭空氣濃厚，遂於民國廿五年秋間，於明治大學畢業後，回到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出版的一間報社總編輯。到次年（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全面對日戰爭興起，上海失守，日軍迫近南京，報社陷於停頓，當時中央黨部第六組，為起用留日學生，特召集在京留學生六百五十餘人，在明孝陵集中訓練，授以各種軍事智識及戰地任務，未滿一個月

敵軍已接近南京，我們六百餘人，匆匆乘小輪到安慶。當時適遇空襲警報，最初原有人主張到英商所屬之安慶江邊太古碼頭躲避，但我和一批同學，堅決反對，並說明日機絕不會因英商產業而不加轟炸，反之因碼頭目標太大，且難民太多，容易引起殘暴的日本空軍的光顧，所以改到江邊隱閉處躲避。結果太古碼頭果然被炸，人民死傷慘重，而我留日班同學，均幸安全，誠不幸中之大幸。我們留日班同學，經過南京、九江、廬山，荊州、漢口地區，經過八個半月之嚴格訓練，於民國廿七年五月，在武昌南湖結業，各同學均分派到前後方工作，我被分發到戰地幹訓團第一團任教官。但在漢口工作僅數月，日軍漸近武漢，我從漢口撤退重慶，應聘到銅梁中央軍校任教官，廿八年一月，中央軍校遷成都，我奉派任軍校黨軍日報編輯主任，並籌備對外發行工作，在報社服務兩年多，使黨軍日報業務蒸蒸日上，尤其在言論方面，站在指導地位，對後方抗戰宣傳工作盡到了我們應盡的責任。

廿九年春天，應成都光華大學之聘擔任教授，生平第一次在大學任教，頗感惶恐，但在此兩年多教學中，由於授課需要，閱讀書籍頗多，並從事寫作「三民主義的科學研究法」一書，該書在桂林出版後，蒙 蔣委員長介公傳令嘉獎，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頒發獎狀及教育部頒發獎金。廿九年一月，同學潘素卿女士，由上海到成都，旋即舉行結婚禮，完成一件終身大事。

民國三十年春，應聘到桂林任省立圖書雜誌審查處秘書，旋奉調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

前夕，忽接團本部通知，團長 蔣公（當時先總統 蔣公兼任團長）翌晨召見，殊為驚訝，我昔年任中央社記者，在國民政府紀念週雖曾見到蔣公多次，亦曾為 蔣公攝影，在留日學生訓練班受訓及中央軍校服務時，亦曾親聆訓話多次，但相信 蔣公未必會對我這位小兵認識，自忖識淺德薄，生活恬澹，向未重視名利，然既蒙召見，總係殊榮，翌晨應召晉謁，平時對 蔣公立德立功立言，為學世欽敬，看到其慈祥可親，尤令人敬佩。首問我學業，現服務機關，及受訓心得之後，對拙作「三民主義的科學研究法」頗為嘉許，最後垂詢可否願意留團服務，擔任訓導工作，余答以願遵命，旋被派為黨政班專任訓育幹事，嗣聞本期（二五期）同學留團服務者，僅我一人，實為殊榮，按編制上，此乃「同少將階級，但係文職。在中訓團擔任訓導工作將屆兩年，直到中訓團結束，始轉任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任簡任編審。在中訓團黨政班兩年期間，因調訓者，均為全國高級、中級優秀文武官員，因此有機會認識各方英雄豪傑及社會賢達，語云：「集天下英才於一堂，人生一樂事也。」殊有同感。

因緣轉入金融機關

余所習者為新聞，以為畢生可從事新聞事業，不意生當亂世，坎坷滄桑，正如呂坤所說：「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三十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美、英加入戰爭，情勢大變，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冬，抗日戰事，已有好轉，英美各國早已宣佈放棄在華不平等條約，日本在各地戰場，已開始潰敗，我朝野一致相信抗日戰爭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決可擊敗日寇，政府為接管日軍，汪精衛及溥儀偽組織，開始準備復員計劃。三十三年十月，承友人劉攻芸先生之挽，入中信局服務，對財政金融既非所長，亦乏經商興趣。想不到一任達十四年之久，於國家、社會及個人，殊少貢獻，實覺虛度韶光，殊以為憾！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日勝利之後，奉中信局派往上海工作，旋被借調行政院敵偽產業處理局兼簡任專員，擔任督導。先在蘇浙皖區，後被派到粵桂閩區，看到一批「奴收大員」貪贓枉法，一片紊亂。而共匪顛覆份子，從中鼓動，蘇俄對共匪實力接濟，美國受了共匪「土地改革者」的欺騙，放棄對我政府支持，使共匪坐大，實行叛國，到了三十八年夏，大陸已大部淪陷，我於三十八年七月一日隨同中信局由廣州來臺，當時情況混亂，幣值慘跌，人心惶惶，幸到了三十九年三月，我最高領袖先總統 蔣公復職視事，政府有了重心，國家有了舵手。三十年來，賴我全國軍民合作，海內外一條心，使我中華民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堅強反共國家，亦使我們成為世界國家中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我們雖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在外交上受到挫折，但我們經濟之發展繼續增長，對外貿易，亦有鉅額增加。我因三十多年來在各大學教授歷史、哲學、經濟、新聞學、音樂諸課程，頗瞭解多難興邦暴政必亡之歷史教訓。一向對國家民族前途，均抱極樂觀態度，對日抗戰初期，以我留學日本的觀察，深信日本軍閥必亡，民國廿七年，即出版「日本必敗論」一書。民國三十八年七月自廣州來

臺後，我曾多次作學術專題演講，指出共匪不能侵犯臺灣，若真要侵犯臺灣，必召覆亡之禍，結果共匪於三十八年十月大舉侵犯金門時，在我英勇國軍堅守之下，使匪軍全軍覆沒，不出我所料。匪偽此種殘暴政權，必將不斷發生大規模之鬥爭，在短時期匪偽政權之崩潰，實在意料中，我由於持有此種信念，深信我們國家民族前途極為光明。

從經濟方面看，由於我們推行民生主義，在二十餘年來每年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不但高過亞洲其他國家，且超過日本。單就我國對外貿易看，在一九七八年對外貿易總額，達二百三十七億美元，超過大陸匪區總額，我們平均每一國民所得，一九七一年為三百三十八美元，一九七八年國民所得，達一千三百七十二美元。到一九七九年，我們國民所得，約為一千五百五十美元，為大陸共匪暴政下人民所得之四倍。

再從治安方面看，在我所會到過的世界廿三個國家中，要算我們中華民國最為良好，實為英、法、美、西德、日本等所謂大國所望塵莫及。像我們這樣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有誰能夠將我們擊倒？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七月由廣州隨同中央信託局抵達臺灣以來，已經卅年，除有七年自費在海外從事教育文化工作外，居留臺灣亦廿三年，在這三十年的旅臺過程中，對國家貢獻雖少，但有數事值得回憶。

金門水利植樹計畫

民國三十八年，匪軍由廈門渡海進攻金門，

賴我守軍英勇抵抗，防衛司令湯恩伯將軍、李良榮將軍、胡璉將軍等，指揮若定，痛殲匪軍，使匪軍全軍覆沒，無一生還，當時我服務中央信託局，除立即與局內老同志周頌西君等，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中信局區分部外，並與局內國樂界同事於三十九年五月間隨同文化界勞軍團到金門前線勞軍，我和祝瑞年君代表中信國樂社一同前往。勞軍團包括有國樂、唱歌、舞蹈、話劇及京戲，並有歌星多人參加，到金門時，始知係當時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所發起，並任命名譽領隊，我們抵達金門後，停留一個星期，到達金門前線每一角落，我們這一批龐大之藝術團，曾受到前線將士熱烈歡迎。我當時看到金門到處童山濯濯，幾乎無一顆樹，由於水源缺乏，農田更不要談。又看到前線守軍因風沙太大，頗多患沙眼者，因此就地草擬金門築壩計劃，植樹計劃，利用太武山水源，建立堤壩，挖掘水塘，蓄水灌溉及飲用；對於植樹，我建議在樹苗旁邊砌防風泥堆，免樹苗受狂風吹折及鹹水侵襲，頗蒙當時司令胡璉將軍之讚許，表示採納。現金門水源足，樹木成林，全島綠色一片，且生產了大批稻米，也許我的建議，不無微勞。從金門勞軍返臺之後，向四行兩局國民黨同志，發起籌募風沙鏡運動，想不到在兩星期內，即募到了兩萬副，後來又向各界續募三萬副，先後共募五萬副，悉數送前線供守軍使用。並接獲胡璉將軍一封很長之感謝電，中央日報亦曾將此消息刊出。民國六十八年元月應聘赴歐洲英、法、德、比、荷、盧及香港講學演奏國樂總蒙各方好評，譽為獲得空前成就。

音樂生涯中日交流

余秉性魯鈍，惟自小愛好音樂，先父雪生公及堂兄敬孚，不但喜好絲竹，且為二胡及揚琴能手。故家中絲竹管絃之樂，各式俱備。九歲時追隨先父及堂兄學揚琴、月琴，後來習二胡三絃簫笛等，由於對於音樂略有基礎，在中小學時代唱歌及彈風琴，常能名列前茅。後來進入上海復旦大學，與愛好音樂之同學組「嶺南音樂社」以彈粵曲為主，社員十餘人，經常在校內外表演。又組織口琴隊，因余係中華口琴會第一班畢業生，當時指導老師為我國口琴名家王慶勳老師，除教授吹奏口琴外，帶講授西樂樂理，余今對西樂理論略有認識，王老師啓蒙之功甚鉅，自大陸淪陷後，王老師隻身來臺，並恢復中華口琴會之組織，教授生徒，常到各地表演，王先生五十年如一日之毅力，令人萬分敬佩。憶民國十八年春天，有一天在上海看報知道在法租界嵩山路大同音樂會舉行中國古樂器展覽，高興萬分，立即前往參觀，看到匏（箏、笙等），土（壎、缶等），革（鼓類），木（木魚、拍板），石（編磬、特磬等），金（鑼、鐘、鈸等），絲（古琴、古箏、大瑟、阮咸、大胡、中胡、琵琶等），竹（簫、笛等），所謂「八音」樂器。當時招呼我的，就是會長鄭觀文先生，他當時似已花甲之年，但循循善誘，對每一件樂器，向予解釋。另有一位琵琶名手衛仲樂君，在旁協助說明各種樂器性能，還試奏南胡、琵琶、大瑟、古箏、壎篪、簫笛等古樂器多種。不但使我對我國古樂留下極深刻印象，並使這優美的古樂音色，對我印下了畢生難

忘的雅聲。從前讀「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以爲過甚其詞，迄今始信孔老夫子所言之不虛。

從民國十八年聽過大同音樂會之古樂後，深感我國優美古樂失傳之可惜，因我國原爲禮樂之邦，且音樂文化興替，與國家之興亡，有密切關係。周、漢、唐三代之興亡，與樂教之興衰，息息相關。若留心我國音樂史者，當可瞭然。史蹟斑斑，令人警覺！加上本人畢生對音樂之愛好，殊有志於從事復興樂教工作，惜乏機緣，更嘆知音之難遇。到民國廿三年留學日本時，某次聽到日本宮廷中之雅樂——能樂——所有樂器，絕大多數爲我國樂器，如古箏、琵琶、簫笛、三絃、大阮、鑼、鼓、鈸、梆子、木魚等，各式俱備，聽到日本「能樂」。正如聽到我國唐宋時代之雅樂、宴樂。樂音高雅、淳美、扣人心弦，絕非日本的「漫談」「民謠」可比，迨後詢問日本古樂家，才知道日本的「能樂」，就是我國唐宋時代的雅樂和宴樂，因唐代日本留華學生，僅在首都長安（今之陝西西安）一地，即逾一千餘人，其中對我國音樂造詣最高者，有小野妹子、橘逸勢及吉備真備等人。唐武則天當政時，曾將琵琶一把，贈送日本政府，迄今仍在日本政府保存，視爲國寶。自從聽到日本之「能樂」以後，對我國古樂，更爲醉心，並從日本各大圖書館中，細讀中國音樂史、中國文化史，了然我國音樂文化之偉大。民國二十四年春，在東京籌組「華聲音樂會」，參加之會員，共廿餘人。以兩廣籍之同學居多，每年國慶或國際慶節，均代表我國參加

表演節目，在東京最大之JOAK電臺廣播節目（當時日本還未有電視）。某次在東京大劇場表演舞臺演出後，曾有大批日本少女到後台，祝我們演奏之成功，並表示願意拜師練習中國音樂，據她們稱，都是有生以來所聽到最優美高雅之音樂，中國音樂之悠揚高雅，實爲日本音樂所望塵莫及云，語意誠懇，頗令人感動。

琴簫自賞振興國樂

從民國二十四年起，日本鑒於我國朝野同心合力建設國家，國力日強，日本軍閥們立下先發制人之野心，侵華空氣，日益濃厚，日人對我留日之「反日」學生，監視日益嚴密，民國二十五年，我在明大的學業已結束，遂束裝歸回南京服務。不到一年，即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七七全面侵略戰，到了十二月初，日軍迫近南京，我們參加的留日學生訓練班，由南京，經安徽、九江到漢口結業。到了民國廿七年秋間，武漢亦告淪陷。我們退到重慶。當時長途跋涉行軍，貴重衣物都丟掉，惟有兩件樂器，一是洞簫，一是琵琶，始終帶在身旁，且朝夕孤芳自賞，當茲生活顛沛大動亂時代，惟有以音樂陶冶性情，保持我的安寧和鎮靜。自從民國二十五年由日本返國服務後，不知經過多少次出生入死，冒多少次危險，猶能保持鎮靜處變不驚者，對音樂之修養，裨益頗多，我總認爲一個人，不但須「防患未然」，尤宜謹記「臨危不亂」，更爲重要。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又遇共匪叛亂，從事顛覆活動，破壞社會秩序，生活奔波，從上海到廣州，四年來迄無喘息機會，但身邊總攜

帶揚琴、洞簫和琵琶三件樂器，一有餘暇，彈奏自娛，清靜清靜自己的腦筋。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隨同中信局由廣州抵達臺灣之後，於民國三十九年，與中信局愛好國樂同仁十餘人發起組織中國國樂社，該社二十多年來，在林燮和、馮萍、何抱生、卓大猷諸君合作下迄未間斷，精神可佩，國樂唱片十餘張，曾獲西班牙國際商展來函讚揚，成爲臺灣各國樂社灌製唱片之最多者。

中華國樂團體成立

爲復興我國音樂文化，民國四十一年，與愛好國樂界人士高子銘、梅慶芳、沈國權、楊作仁、黃宗識、黃體培等十餘人，發起組織「中華國樂會」經五次開會討論才決定組成全國性之學術團體，由我起草組織簡章，承吳鐵城、蔣經國、何應欽、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方治、李宗黃、陳紀滢等社會賢達，黨國前輩之署名贊助，經一年之籌備，始經內政部之批准立案，「中華國樂會」卒於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正式成立。最早參加之國樂團有中信國樂社、中華國樂團、大鵬國樂團、凱旋國樂社、潮聲國樂團、鐵路國樂社。後來又有海天琴社、穗聲國樂社、農鐘國樂社、政大國樂社、薰風國樂社、幹校國樂社、琴心國樂社，及南胡樂社，全體社員約二百餘人參加，選出高子銘等十四人爲理事，余復被推舉爲常務理事。隨後連任五屆常務理事。

二十年來，中華國樂會在各社員及朝野支持鼓勵之下，會務發展頗速，除出版數十種有關國樂書籍之外，並推介各會員到歐洲、南北美、日

本、韓國、東南亞各國講學演奏，凡數十次。目前在臺灣之國樂團，逾二百以上，包括小學、大專學校及機關團體。練習國樂人數，最少超過二十萬人。余於民國四十八年三月應美國洛杉磯世界博覽會之請，赴美演奏，先後在舊金山、芝加哥、西雅圖、休倫、華盛頓、紐約、沙加緬度、柏克萊等三十個大城市演出，亦曾在美加兩國最大之NBC、CBC電視臺演出。四月五日，在洛杉磯世界商品博覽會表演時，當時總統杜魯門亦在座。綜計在美加兩國兩年半時間，先後公演逾一百次，所到之處，報章恆在頭版新聞刊出，承美國國務院將本人姓名，列入世界音樂名家檔案，並被邀請參加全美國音樂家協會Musicians Union為會員，自忖乃一業餘音樂人員，乃蒙美國朝野如此重視讚揚，絕非本人技術之精，實由於國樂風格之高，內容之富，以及旋律之美，而獲國際人士歡迎所致。

在留美期間，於民國四十八年秋，應加州舊金山及屋崙Oakland兩地華僑青年之邀，曾在上述兩地開設國樂班，定名為「中華國樂社」，參加練習國樂之學生，有美國、日本、韓國及土生華僑青年，亦有七十二歲之老翁，六十二歲之名女醫。更有十一二歲之小學生先後共一百餘人，並組成一規模宏大逾三十五人大國樂團，經常在舊金山、屋崙兩地公演，每逢國慶年節，或太平洋國家展覽會，均由中華國樂社代表國家演出。直到現今，中華國樂社，仍為舊金山最大之國樂社。且經常有活動。在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又分別在舊金山及屋崙兩地舉辦有史以來首次中國樂

器展覽會，展出「八音」樂器凡二百餘件，包括宋明兩代之古琴、洞簫、小笙等名貴樂器，當地報章曾有專文介紹，對我樂教宣傳，弘揚漢聲，殊多貢獻。

民國五十年六月，因兩年在海外過着飲食無定，生活繁忙的生活，竟患了嚴重胃病及失眠症，同時在美居留過久，一再延期，手續亦較麻煩，遂於五十年六月回國，任教國立政治大學，除教授新聞系科目外，承劉季洪校長之聘，開「音樂科」課程，專授國樂理論及國樂器，定為二學分，課程定為一年。又組織「華夏國樂團」，購置國樂樂器數十種，參加國樂團之同學，最初僅有二十餘人，後來人數陸續增加，到目前政大華夏國樂團團員，已逾百人，水準亦較昔年大為提高。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曾應香港新亞書院之邀，到港各大學講學及表演共十餘次，頗受香港各報之讚揚。

華夏雅樂揚聲海外

民國五十三年八月，應祕魯民醒日報之聘，到首都利馬任總編輯，到職未久，即應當地最大規模之第十三號電視臺之聘，獨奏表演一場，是晚表演之古樂器，僅古箏、揚琴，及洞簫三種，事畢，該臺贈余一百九十美金，余為促進中祕兩國友誼，遂將該款悉數捐助給祕魯紅十字會，由祕魯全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接受。贈款儀式，仍在該電視臺舉行。輿論頗為轟動。在祕魯四年半期間，曾公開表演者，凡三十餘次，所有大電視臺，均曾邀請演出，更有各大報章，作專文介紹，

例如祕魯銷數最大之「商報」，及「消息」報，曾數度刊出長篇專文介紹中國音樂，及本人對中國音樂文化對世界音樂貢獻之談話，祕魯全國記者公會，更致請本人參加該會為正式會員。在祕魯辦報期間，因民醒日報係最反共之報紙，經常刊出反共之文章，並揭穿共匪販毒及顛覆滲透陰謀，祕魯因係以「民主」為標榜之國家，共黨公開活動，中共匪幫，利用此種漏洞，一方面以重金收買政府官員，及大眾傳播主管；一方面也設立華文日報社，華語電臺及華文雜誌，由匪謀在後臺支持為共匪當啞叭狗，可是祕魯三萬多僑胞，因多有親屬在大陸，對大陸匪區之殘暴情形，瞭如指掌，百分之九十以上僑胞係反共的，故共匪宣傳工作，殊少收效，但由於民醒日報乃反共最力之報紙，共匪曾用盡各種方法，意圖破壞，惟鬼魅技倆，終難得逞，最後曾用電話恐嚇，要將民醒日報人員，全部炸死，我們老早看穿共匪此套卑劣無恥手段乃恐嚇性，置之泰然，絕不恐懼，共匪其奈我們何。

民國四十七年元月，利用報社三月假期，到南美之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及巴西作旅行演奏，除獲當地我國大使館及僑團熱烈歡迎外，各國朝野，上至總統伉儷，各部部长，國會議員，文化界首領，音樂界領袖多親來欣賞，音樂界及輿論界更多好評，有關南美各國對我國音樂之好評及表演照片，就所看到剪下留紀念的，已有數百則之多，尚有未看到的，更不知有多少，回憶曾在智利表演一場，將門票收入，悉數捐助智利北部作地震災區捐款，希望促進中智

邦交。綜觀他們對我國樂風格之高雅，旋律之美妙，內容之豐富，讚揚特多，在南美七國表演完畢，再返回利馬。到了民國五十八年春，祕幣急劇貶值，祕政府親共日益顯著，工作難以展開，生活亦無法維持，遂決計歸國，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假道厄瓜多、哥倫比亞、巴拿馬、牙買加、邁阿密、紐約、華盛頓、三藩市、洛杉磯、檀香山、東京、漢城返國，先後參加各國電視臺大音樂堂之表演凡三十餘次，亦曾蒙各國朝野熱烈歡迎及音樂界之好評，以我對國樂修養之淺薄，竟受到如此熱烈歡迎，殊出意料，我想若能組織較大規模之藝術團體出國，從事國民外交，對增進國際宣傳，提高我國地位，弘揚我國文化，定有助益。

在旅居中南美洲四年半及兩次旅行演奏中，歷經十二個國家，目睹共匪在中南美各國從事顛覆滲透活動，其中最著者為將大批毒品運到中南美洲各國推銷，一方既毒化中南美國家青年，同時可利用這批吸毒份子，做他們的走狗，將販毒收入大批金錢，收買各國政要，尤其軍政首長，供其驅使，正如共匪毒化歐美青年和收買印尼前總統蘇卡諾一樣。此種作風，非常毒辣，自從民國五十三年我抵達祕魯之後，看到此種情形之可怕，曾大聲疾呼，提高警覺，應爭取中南美國家每年在聯大成爲支持我們的「鐵票」，並宜對這些友邦，增加貿易及經援，多給物資援助和加強國民外交，否則國際局勢一有變動，中南美有些國家會在共匪收買之下，倒向匪方，連我聯大席位亦不保。我在旅祕四年多期間，每次遇到我政

府所派中央大員經過祕魯時，均曾以此種利害奉告，並希望當局早作準備，此種見解，果不幸而言中，到了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匪區歸來後，與我一向有良好邦交之祕魯、厄瓜多、智利及牙買加，均已顯露親匪色彩，並表示公開承認共匪，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大舉行排我納匪案時，係以四十票對四十五票通過。倘若上述四個國家當中有兩個國家係投我國的票，結果亦係四十七對四十七，共匪不能獲多數票入會，倘若能在一九七一年對共匪入會案能迎頭痛擊，打擊共匪瘋狂叫囂，最少日本不會追隨其他國家承認共匪，即在一九七二年度，共匪再想入會，恐更不容易。所以一九七一年我們所失的聯大兩票，乃最大失策，失去中南美洲兩個國家的支持，這實爲一時代悲劇，雖然我能及早一年退出聯大，使我朝野更加強合作努力，自力更生，使一年來我國經濟，能加速發展，收穫於意外，但在外交上言，我們總是一項大損失。

研究改進國樂樂器

自民國五十八年六月返抵國門後，經三個月休息，並寫完「南美國家及華僑事業簡介」一書之後，感於個人德薄能鮮，淡於名利，不敢從政，遂重返國立政大，中國文化學院及國立藝術專教，除教音樂之外，兼授理則學及國父思想諸科，功課雖忙，與數百名青年朝夕相處，甚爲相得，尤其在藝專上音樂課時，歌聲琴音，與各人的心靈交流，把我們每一人的心願在每一樂器上表露出來，天真無邪，絃歌之聲不輟，洵樂事也。

三年半來，除授課外，利用課餘之暇，從事研究改進中國樂器工作，因我國現有之傳統國樂，優點固多，但多數絃樂器音域狹小，不足以奏演西方大樂曲。管樂器則欠缺大喇叭樂，音量未够洪亮，不能代表作軍樂之用。打擊樂器缺少定音鼓、定音鐘、定音磬，經三年半來，用個人能力財力，除改良年前所製成之篳琴之外，現創製成功者有新型「篳琴」、「立即變調三盤揚琴」、「立即變調四盤揚琴」、「七音二十二絃古箏」、「仿唐尺八簫」，及「十二面圓形編磬」。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承教育部文化局王局長洪鈞先生之邀，曾在臺北市實踐堂舉辦本人新創國樂器演奏會，試音效果，證明各樂器之性能頗佳。在我創製的「篳琴」，變調揚琴，共含有五個以上高八度，可彈許多西方樂曲，爲我國樂器音域之最廣者。且均可按半音，更可按頭音，亦爲西方豎琴所不及。民國六十二年二月我籌備的「中華樂器學會」，亦已成立，今後對國樂器之改進，更可多有機會研究。民國六十六年製成古式同型異音編鐘編磬各一套。爲民國以來首創並創製四絃半音奏琴。

回溯五十年來，東西流浪，南北奔馳，從東半球到西半球，亦到南北極邊緣，走過許多國家，看到許多新鮮奇怪事物，但對國家殊少貢獻，過去更未能對我嚴父慈母略盡孝道，與念及此，愧疚交併，今後惟盡我未來餘年，從事教育工作，培植建國復國英才，俾能早日光復大陸，解救八億同胞，如是而已。